# 王阳明佛教观研究

#### 张 刚 李婷玉

摘 要:从王阳明佛教观出发,以儒者自身对佛教的认识与评价为契入点来呈现比较真实的儒佛关系。认为王阳明已逐渐摆脱狭隘的宗派立场,开始在是非问题上寻求儒佛异同的答案。儒佛不只是对立的,也是互补的,佛教许多思想内容能够为儒学所借鉴学习,尽管彼此存有差异。儒学兴衰在根本上非源于佛教的传入,而在于儒者不能自得圣人心性之学,因此,重振儒学不必以排斥佛教为手段,而在转变儒者专务文句辞章的虚浮学风,以学贵在为已为标的。最终彰显了王阳明兼容并包的学术胸怀和客观公正的为学精神。

关键词: 王阳明; 儒学; 佛学; 儒佛关系

作者简介:张刚,男,教授,哲学博士。(玉溪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云南 玉溪,653100)

李婷玉,女,硕士研究生。(云南大学 哲学系,云南 昆明,650000)

中图分类号: B9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6552 (2014) 01-0089-05

王阳明自称曾笃志佛学二十年深得其端绪,即便在晚年还以儒佛互释自赞,以至时人皆目其学为禅学。这说明作为心学集大成者的他,不唯对儒学有研究,在佛学方面亦有着独到的见解。然而,王阳明的佛教观至今仍是个未知领域,笔者愿对此做些初步的探索工作。

### 一、儒佛定位

儒佛关系,自从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即有热烈的讨论。东晋孙绰写的《喻道论》,认为儒佛求道方式虽不同,但在出发点和目标两方面却是一致的;慧远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从多个角度论证了儒佛关系,认为两者可以并存而相安。在唐代,儒佛关系依然是思想界争论的重要话题。王通主张三教融合,无分彼此;韩愈则要求消灭佛教。宋代儒士都以排佛为主,但以契嵩为代表的僧人,却主倡儒佛互补。面对如此丰富的观点资源,王阳明是如何论儒佛关系的呢?

在儒佛关系上, 王阳明首先反对宗派偏见的武断, 要求定之于是非。

(郑德夫)问于阳明子曰:"释与儒孰异乎?"阳明子曰:"子无求其异同于儒、释,求其是者而学焉可矣。"[1](238)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佛教长期被视为野蛮文化的代表,而对儒学道统而言,则又被视为"异端"。这种基于偏见的观点自然无利于正确理解儒佛关系。因此,王阳明明确反对从形式上区分"正统"、"异端",要求以内容的"是"与"非"来判断儒佛的优劣。他又说:

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2](248)

一种学说不能因是孔子、朱熹所说的就视为真理,而应立足是与非的判断;如果它不符合公道是非,即便是孔子、朱熹所言也应视为"异端",坚决抛弃,反之,即便出自佛教,我们也应继承发扬。正是有了这种超越宗派主义的豁达胸怀,才使得王阳明能够相对合理地理解儒佛关系。

与视佛教为洪水猛兽的儒学家不同,王阳明认为儒佛虽有差异,但本质上是相同的:"道一也,而 人有知愚贤不肖之异焉,此所以有过与不及之弊,而异端之所从起与?"[1](861)佛教的流弊不在于道体上 有什么问题,只因偏颇的理解所导致。因此,如果能撇开细节上的差异,就终极层面来看,儒佛是一致的。在《谏迎佛疏》一文中,王阳明曾苦口婆心地这样来劝说当时好佛的正德皇帝:"诚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恳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务得其实,不但好其末而必务求其本,则尧、舜之圣可至,三代之盛可复矣。岂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sup>[1](294)</sup>只要能得佛学之本就可以成就儒家极力称赞的尧舜盛世,言下之意,就是认为佛至尽处便是儒了。

作为儒家学者,王阳明虽不能彻底摆脱儒家"道统"意识的束缚,但淡薄这种意识的企图也还是 很明显的,如其云:

今佛氏之书具载始末,谓释迦住世说法四十余年,寿八十二岁而没,则其寿亦诚可谓高矣;然舜年百有十岁,尧年一百二十岁,其寿比之释迦则又高也。佛能慈悲施舍,不惜头目脑髓以救人之急难,则其仁爱及物,亦诚可谓至矣;然必苦行与雪山,奔走与道路,而后能有所济。若尧,舜则端拱无为,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亲九族,则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则百姓昭明;协和万帮,则黎民于变时雍;极而至于上下草木鸟兽,无不咸若。其仁爱及物,比之释迦则又至也。佛能方便说法,开悟君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杀,去人之贪,绝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诚可为大矣,然必耳提面诲而后能。若在尧、舜,则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至诚所运,自然不言而信,不动而变,无为而成。[1](295)

通过对释迦牟尼与尧舜生平事迹的对比,王阳明虽意在验证儒学境界胜于佛的"道统"观点,但 在无形中又不自觉地流露出他对佛教那种献身、仁爱之精神的称赞。因此,王阳明反对在儒佛之间划 出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而主张"儒体佛用":

圣人尽性致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我所用,见佛氏则个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已则自处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1](1180)

在这里, 王阳明虽称佛为"小道", 但在"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的心性之学方面, 他认为儒佛还是一致的, 因此, 不要盲目排斥佛教, 而要有"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的包容胸怀, 积极吸收佛教中有益的部分来充实儒学, 为儒所用。

#### 二、儒佛之异

王阳明虽然比较首肯佛学的价值,但不代表他完全等同了儒佛,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他能比较透彻地看清儒佛之间的差异,才使其能比较客观地理解和对待佛教。其实,儒佛之异是王阳明一生都很关注的问题,并形成许多卓越的观点。

公私之异。公私之辨是儒家特别关注的话题,孔子、孟子皆主公去私。王阳明深得孔孟之法,认为儒家主张天下为公,有为于世,以尽人间之道。他说:

夫禅之学与圣人之学,皆求尽其心也,亦相去毫厘耳。圣人之求尽其心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吾之父子亲矣,而天下有未亲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君臣义矣,而天下有未义者焉,吾心未尽也;…故于是有纪纲政事之设焉,有礼乐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辅相、成已成物,而求尽吾心焉耳。心尽而家以齐,国以治,天下以平。故圣人之学不出乎尽心。禅之学非不以心为说,然其意以为是达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于其中则亦已矣,而亦岂必屑屑于其外;其外有未当也,则亦岂必屑屑于其中。斯亦其所谓尽心者矣,而不知已陷于自私自利之偏。[1](257)

儒家以人为万物之贵,与天地并立为三,人所应尽者人道,尽人道即是要理会人伦是非,关心世事。儒家道德教化、尽心之说皆因此而设,所以是公。与儒家不同,佛家以万法为幻,以世俗生活为

累, 主张遁迹山林, 故背弃人伦, 遗忘世事, 只求个人解脱, 因而是私。

动静之异。佛家视万象皆虚幻不实,无生无灭,所以主倡禅定,令心止于一处,断绝一切苦乐感受、心神动摇,此乃佛家之静。儒家也讲静,如周敦颐就曾提出"主静立人极"的思想。但王阳明认为儒佛之静有着本质区别:

问:"儒者到三更时分,扫荡胸中思虑,空空静静,与释氏之静只一般,两下皆不用,此时何所分别?"先生曰:"动静只是一个。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只是存天理,即是如今应事接物的心。如今应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心。故动静只是一个,分别不得。知得动静合一,释氏毫厘差处亦莫掩矣。"[1](269)

静是儒佛共有的修养方法,从形式上看确实也基本相同。但王阳明认为,儒家之静非与动相对的静,而是合动静为一的静,只要循于理,静即动、动亦静。佛家之静却分割动静,于动之外求静,结果不免堕入空寂:"且欲绝世故,屏思虑,偏于虚静,则恐既已养成空寂之性,虽欲勿流于空寂,不可得矣。"[1][191]

善恶之异。明善去恶是儒家立论的宗旨,而佛家超脱尘世,视一切为无差异的空幻之相,自然就主张无善无恶,因此,在善恶问题上儒佛之间有着绝对的区别。但王阳明认为,儒家所言之善在终极意义上也是无善无恶的,如其"四句教"云:"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2](289)这里的"无善无恶"即指人之本性。那么,就产生了儒佛"无善无恶"论如何区别的问题。王阳明与学生的这番对话颇能反映这个问题。王阳明说:"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学生感到疑惑就问:"佛氏亦无善无恶,何以异?"佛教提倡的就是"无善无恶",如果儒家也讲"无善无恶",那么儒佛又有什么区别呢?王阳明接着解释说:"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然遵王之道,会其有极,便自一循天理,便有个裁成辅相。"[2](147)换言之,儒家所谓"无善无恶"并不是取消世间善恶价值判断,而是指人超越个人好恶、完全遵循天理的为善境界。佛家则彻底取消了善恶分别的必要,因此不同于儒家。

**有无之异**。外于人心的世界、事象以及人自身究竟是一种幻象,还是一种客观存在?这是困惑哲学家的千年难题。佛教认为,万法因缘而生,又因缘而灭,所以无真正的自性,世界在本性上就是一种幻化的存在:"浮屠氏以寂灭为宗,其教务抵于木槁灰死,影绝迹灭之境,以为空幻。"[1](1046) 王阳明非常反感佛家对世界的这种定性:

佛氏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虚无的本色了,便于本体有障碍。圣人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日月风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未尝作得天的障碍。<sup>[2](278)</sup>

佛教以草木鸟兽有生老病死相,故谓之无。殊不知万物的变化皆源于良知,良知即为太虚;太虚虽无形无色,但却真实存在,不可谓无。在王阳明看来,儒佛有无之异还可由心之有无表现出来。心是儒佛修身养性的根本。由于佛家否认世界的真实存在,所以视心也空幻不实。王阳明则认为,心不离人伦物理,蕴藏着天地万物的本性,是最真实的存在:"佛、老之空虚,遗弃其人伦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谓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遗也。"[1](245)在王阳明 31 岁那年,因厌烦科举、训诂之事,遂生离家出世之心,"唯祖母岑与龙山公在念,因循未决。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1](1226) 这说明人心本有的亲情无法祛除,是真实具在人心,所以人心不虚。从经验层面看,心其实又可理解成念,即思想观念的集合。佛教向来以"无念"立宗,认为只有排除内心一切思想观念,才能获得非苦非乐的寂静之境。而儒家认为人心不可能无念,念念相续,无一时能了,因此,人的超越不能期指无念境界的出现。

九川问:"近年因厌泛滥之学,每要静坐,求屏息念虑,非唯不能,愈觉扰扰,如何?" 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当自有无念时否?"先生曰:"实无无念时。"[1](262) 陈九川要学佛家的静坐,以求无念,但最终反而更感到内心忧扰。王阳明喻之,心念不可去,惟在 正,能以正念,虽念即静,所以佛家企图屏去一切心念的做法,无疑违背人心的自然本性。

总之,由公私、动静、善恶、有无态度等方面看,儒佛异道十分醒目。在公私方面,儒家为公,佛家为私;在动静方面,儒家动静合一,佛家流于虚静;在善恶方面,儒家为善去恶,佛家无善无恶;在有无方面,儒家主有,佛家志无。如此,王阳明思想世界中的儒佛的主要差异便凸显于世人面前。值得注意的是,王阳明于儒佛之异的揭示,自然是以儒学为坐标的,但是非优劣的个人倾向并不明显。

## 三、王阳明与程朱佛教观比较

宋明儒学家都很关注佛教,均以捍卫儒道为使命。但在儒家内部,不同的儒家学者对佛教态度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因此,有必要把王阳明与程朱佛教观进行比较,从中既可丰富王阳明佛教思想的内涵,也能发掘出其在历史嬗变过程中的特殊贡献。

"辟佛"与"用佛"。程朱极少正面肯定佛教的价值。他们不满于佛教视世事为幻的世界观,痛恨佛教教义的自私特征,对佛教的生死观、人性论、生活方式,都持批评态度。这种因"辟佛"而生的偏激态度导致他们产生近乎荒谬的佛教观念。如二程说:"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谓迹者,果不出于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其道,则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于先王,固不愿学也。如其合于先王,则求之六经足矣,奚必佛?'"<sup>[3]</sup>以"迹"代"心"固然有合理之处,但行为与思想毕竟是有差别的,故而以"迹"代"心"而否定佛教整个思想是不科学的;更何况这种评价又是建立在对佛教之道不十分了解的情况下提出的,二程于佛教态度之荒谬可见一斑。朱熹的佛教态度也好不到哪里。如他说:"佛老之学,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废弃三纲五常,这一事已是极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说。"<sup>[4]</sup>只因佛教出家离世,不守人伦,朱熹就判之罪大恶极之名,进而否认佛教其他方面的价值。这种武断态度比二程有过之而无及。王阳明虽也批判佛教,但始终认可佛教自身的价值,甚至有补于儒学的完善:"前在寺中所云静坐事,非欲坐禅人定也。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拿,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sup>[1](1230-1231)</sup>佛教坐禅人定陷于空寂虽不对,但依然可以用来"收放心",弥补儒家心性修养方法上的不足。两相比较,王阳明的佛教观无疑比程朱客观公正许多。

"佛兴儒衰"与"儒兴佛衰"。自创宗立派以来,儒学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地位。但佛学的传入,使儒学的这种正统地位受到威胁,以至在隋唐佛学大盛时期,儒学被彻底边缘化。这必然激发儒学家的卫道意识,进而反思儒家式微的原因。程朱把这一切原因直接归咎于佛教的入侵和其对人心的蛊惑。如朱熹说:"异端之害道,如释氏者极矣。以身任道者,安得不辨之乎!如孟子之辨杨墨,正道不明,而异端肆行,周孔之教将遂绝矣。"[4](3039-3040) 王阳明则认为,儒学的衰败根本原因不在佛教的传入,而在于儒学者不知明道体,专务外在功利所致。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儒家学徒都只是在表面上争侍孔孟之道,骨子里却蝇营狗苟于个人名利,因此,许多儒学家未必有佛教徒有得道体。

今世学者,皆知宗孔、孟,贱杨、墨,摈释、老,圣人之道,若大明于世。然吾从而求之,圣人不得而见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爱者乎?其能若有杨氏之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净自守、释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杨、墨、老、释之思哉?彼于圣人之道异,然犹有自得也。而世之学者,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谓圣人之道劳苦无功,非复人之所可为,而徒取辨于言词之间;古之人有终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为若是亦足矣,而圣人之学遂废。则今之所大患者,岂非记诵词章之习!而弊之所从来,无亦言之太详、析之太精者之过与!夫杨、墨、老、释,学仁义,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学者以仁义为不可学,性命之无为益也。居今之时而有学仁义,求性命,外记诵辞章而不为者,虽其陷于杨、墨、老、释之偏,吾犹且以为贤,彼其心犹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后可与之言学圣人之道。[1](230)

在王阳明看来,学贵在自得,而非文句辞章的记忆。但后世儒家学者却"徒取辨于言词之间",不

肯于道体上切实下工夫,结果都自足于文字表面,不能究圣人自得之学,这是儒学衰微的根本原因。相应,杨、墨、老、释,这些被儒家称为异端的学派,却愿意"学仁义,求性命",力求自得于心,虽于道体上略有偏失,但在境界上无疑超过"俗儒",那么人自然就转而信奉"异端"之学,背弃儒学。因而,重振儒学不在积极地批判佛学之类的异端,而在于自明儒家道体,转变儒家士人的学风。"今学者不必先排仙、佛,且当笃志为圣人之学。圣人之学明,则仙、佛自泯。不然,则此之所学,恐彼或有不屑,而反欲其俯就,不亦难乎?"[1](186)这是王阳明首肯的他学生所说的一段话。在其来看,儒学家不必忙于排斥仙、佛,先笃志于儒学,提升儒学家自身修养,那么异端之学不攻自灭。否则,以现今儒者的所作所为,不要说消灭佛教之类的异端,就连佛家之人都不屑为儒,又何谈重振儒学。

当然,王阳明与程朱佛教观还存有很多相同之处,如:都批判佛教;视佛为私,背弃人伦;只求自我解脱,不可用于治世等。这些观点在上文已作交代,故不再赘述。

#### 四、对王阳明佛教观的检视

如上我们由"儒佛定位"、"儒佛之别"、"王阳明与程朱佛教观比较"等三个方面,将王阳明关于佛教的认识、理解较全面地展示了出来。面对如此丰富、深邃的王阳明佛教观,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呢?

**王阳明佛教观的偏失**。王阳明虽出入佛老 20 年,阅读过大量的佛教经典,也不乏对佛教思想的睿智卓识,但他对佛教的认识、理解并不是很符合佛教实际情况的,有许多欠缺之处。比如,关于佛教自私自利特征的指认就值得商榷。按照儒家的立场,只有积极参与社会的修、齐、治、平,才是公,才是正。但王阳明不知道,佛教虽然远离世俗,遁迹山林,放弃对俗世的责任,但他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以及到处宣扬仁爱和平之道,所以不能以自私自利简单概括之,而更应说佛教只是以自己的方式关注现实。又如,佛教虽然主张超越善恶,但不代表不提倡为善去恶。在佛家来看,人只有多行善事,才能跳出轮回,获得解脱,"诸恶莫做,众善奉行,是谓佛教",因此,王阳明斥佛教毁灭道德的观点是不妥的。再如,佛教虽以"无念"为宗,但"无念"不代表灭绝所有思想观念,而是"见一切法,不著一切法"[5],所以王阳明斥佛教断绝人意识的观点是不恰当的。总体上看,王阳明对佛教的认识和理解存有一定偏颇,从而妨碍了他对佛教认识评价的完整性、完善性。

**王阳明佛教观的学术价值**。王阳明佛教观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其中所显示的学术价值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第一,"兼容并包"的学术胸怀。长期以来,佛学一直被儒家斥为异端,极力批判,但王阳明身为儒者,却力言"二氏之用,皆我之用"。要求人不要盲目排斥佛教,而要善于从佛教中吸取有益思想来完善自身,显示出儒者少有的博大宽容的胸怀。第二,"定以是非"的判学原则。由于同中国古代政治、伦理、习俗紧密联系,儒家非常容易形成以正统为基调的宗派主义,所以对产生于蛮夷之地的佛教很难持客观公正的评判标准。而王阳明却明确反对以"出身"断学问高低,要求"定以是非",即从思想内容出发,评判儒佛优劣;合理的则为"是",则可吸收,反之即为"非",则坚决抛弃。第三,"客观公正"的为学精神。王阳明为学如其人,光明磊落,公正无私。他不仅批判佛教,也批判儒学,甚至对那些"俗儒"的批判甚于佛教,认为他们还不如有修行的佛教徒。这种不护短的批判精神彰显了王阳明客观公正的为学精神,于今之学术界亦有切肤之教也。

#### 参考文献:

- [1] 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2] 王阳明. 传习录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3] 程颐,程灏. 二程集(第一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69.
- [4] 朱熹. 朱子语类 [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7: 2719.
- [5] 李申. 敦煌坛经合校简注 [M].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9: 46.